

海南人下南洋的历史考察

唐若玲

(海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海南 海口 571158)

[摘要] 海南位于海上丝绸之路上, 海南人很早就参与海外贸易, 有些人因贸易的原因“住番”, 久而久之成为早期华侨。近代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 在西方列强开发东南亚和国内生活贫困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形成下南洋的高潮。此后, 海南人下南洋的多寡, 既与海南社会秩序好坏有关, 也与东南亚经济政治环境有关。近代海南人下南洋主要有自由移民、客头招募和洋行招募三种形式。在下南洋的海南人中, 文昌人是主体, 并且下南洋的海南人在很长时间里有女人不出洋的所谓“乡规”。

[关键词] 海南; 海南人; 下南洋; 贸易 “猪仔”

[中图分类号] K 29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0166(2015)03-0110-09

海南人何时迈出移居外国的脚步, 至今未发现可靠的史籍记录。但可以肯定的是历史悠久。南海诸岛、东南亚和印度洋等地考古发掘出来的大量自南朝、隋、唐、宋、元、明、清至近代的陶瓷、铁器、沉船等文物显示, 西沙群岛等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与东南沿海通往东南亚、印度洋及世界各地的海上必经之路。这条必经之路也称为海上丝绸之路。由此可推测, 这必将对位于这条航路上的海南岛产生重大影响。据史书记载, 由唐至五代时期, 海南岛的海上贸易开始兴起。宋代以后, 由于人口增加、“田不足耕”等原因, 福建漳州、泉州和内陆其他地方的民众, 纷纷离开居住地, 向外迁移。这其中, 有不少人迁入海南境内居住。今天的海南话同属闽南语系, 便是这一大量移民现象的历史印迹。在海南居住的这些移民中的一部分人, 随着海上贸易航路的开通而南下通商, 到南洋一带活动, 成为早期华侨。

一、海南人下南洋的历史脉络

海南人出洋历史应是从唐代开始的。《新唐书》卷43下《地理志》记载了一条大致从广州启航, 向南航行到珠江口的屯门港, 尔后折向西南, 经海南岛附近之七洲洋, 到达越南东南部的海面, 再南行到马来半岛湄公河口, 过新加坡海峡到苏门答腊, 由此东南往爪哇, 西北穿过马六甲海峡, 越印度洋抵斯里兰卡和印度半岛之南端, 沿印度西海岸而上入波斯湾, 溯幼发拉底河而上至今天的巴格达城的航线。在这条航线上, 海南的七洲洋是一个重要的结点。据《南洋记》记载“七洲洋在琼岛万州之东南, 凡往南洋者, 必经之所。”^[1]

到了宋代, 海南的对外贸易较前朝更为发达, 其时的琼山、临高、文昌、乐会等各贸易港都设立市舶司, 征收科钱。而白沙津(神应港, 今海口市白沙门附近)已成为商船进出的重要港口之一, 外国船舶常停泊于此。王象之在《舆地纪胜》中曾记载“琼州白沙津, 蕃舶所聚之地, 其港自海岸屈曲, 不通大舟, 而大舟泊海岸。”当时海南进岛的商品有盐、铁、鱼、米, 尤以粮食为主; 出岛商品以土特产为主, 有香料、槟榔、椰子、吉贝(棉花)、苧麻、赤白藤、花纆、黎幕、青桂木、花梨木、海梅脂、琼枝菜、海漆、荜拔、高良姜、鱼鳔、黄蜡、石蟹等, 尤其以香料、槟榔、吉贝最为有名。

海上贸易的兴盛促使一部分从事这一活动的海南人“住番”, 久之不归而成为华侨。其实“住番”者还并不是真正意义的华侨, 因为“住番”一般是指中国古代沿海地区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人到东南亚经商时, 由于当时航海技术的关系, 去时贸易帆船要乘阴历10月到来年2月左右的东北风前往, 返程时要等待6

[收稿日期] 2015-07-08

[作者简介] 唐若玲(1962-), 女, 海南文昌人, 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主要从事思想政治理论和海南近现代地方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月到8月的西南季风兴起时才能回返。期间,船上商人要在当地等待一段时日,这一行为称为“住番”。只有久逾不归者方称为华侨。

由于年代久远,海南人出洋的时间说法不一。据《琼海县志》记载“邑人出洋始于唐代。其时,从福建漳州、泉州、莆田和广东等地移居于邑境的一部分商人和渔民,因受不起天灾兵祸之苦,再乘舟楫,远渡重洋,移居于南洋群岛,为本县最早的出国华侨之一”^{[2]3}。文昌人向海外移民的时间有不同的看法,1999年出版的《海南百科全书》称“文昌人移民海外始于明朝”^[3]。文昌县志认为:文昌人出洋时间为宋末元初^{[4]490}。

概言之,海南人出洋历史悠久。到了明清两代,海南人出洋的步伐大大加快了,主要是由于当时国际国内大背景所致。

从国际方面而言,以葡萄牙、西班牙为代表的早期殖民者,自地理大发现后,为了扩大资本原始积累,开拓海外市场,热衷于海外殖民。15世纪中叶至16世纪初期,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贸易势力纷纷向东扩张,终于使东西海上贸易势力在中国沿海及南洋各地发生了直接的接触和碰撞。1600年,英国成立东印度公司,在英国政府的支持下,把殖民势力伸到东方。1602年,荷兰人也成立了“荷兰东印度联合公司”,取得了整个印度洋区域的航运和贸易的特权,也把触角伸到东方。荷兰、英国殖民者在侵占马来半岛和群岛的过程中,使用的是早期殖民者常用的赤裸裸的血腥战争手段,用武力劫掠当地民众的财物,屠杀反抗之土人。这种野蛮的殖民行为,导致当地人口锐减,以致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巨大的劳动力缺口。这种情况,为中国东南沿海民众移居荷属东印度提供了机会。因此,西方殖民者的到来,产生了中国东南沿海民众下南洋谋生的外部拉力。

而从国内形势来说,明朝中期以后海洋社会经济的兴起和社会秩序被破坏,是造成沿海民众移民海外的内部推力。随着中国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提高,整个中国包括海南的对外贸易活动更加频繁。由于出洋商船活动频繁造成的交通便利,东南沿海形成了海外移民潮流。此外,明清时期,东南沿海特别是福建、广东等地人口与土地的尖锐矛盾,是造成大量移民出现的最主要原因。

在早期的海外移民中,以福建、广东两省的人士为多。雍正五年(1727年)九月九日,闽、粤地方官员在奏折中称“前往噶喇吧、吕宋等处贸易居住者,福建省为十之六、七,广东与江苏、浙江等省为十之三、四。”而福建的移民中,又以“漳(州)、泉(州)等地民众留居噶喇吧、吕宋者为尤多”。海南当时隶属广东,在广东的对外移民人数中,当也包含从海南前去的人士^[5]。

海南人大量出洋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海南人出洋最早的地方,一般认为是与海南隔海相望的越南以及邻近越南的泰国等地。因为在海南人开辟的到东南亚的航线中,最早出现的是前往越南的航线。“从1695年冬开始,两艘200担的帆船队,从琼山演海乡开往泰国,到1735年,这支船队发展到73艘,常年川走于东南亚各国之间,这便是琼山最早的帆船队。”^[6]后来海南人开辟的航线,也基本上经越南而继续前行。如后来开辟的航线之一是“由海口及文昌之铺前港,取道海峡往西,再南下走西贡、曼谷与星洲等处”;之二是“由清澜、博鳌、藤桥、三亚、海头等港直接南下赴上述目的。每年一次,于阴历冬至前后乘东北季风南下,至翌年夏间南风时返航。每年出南洋大型帆船总数约百余艘。其中,赴暹罗者40艘,赴交趾北部者50艘,南部者25艘。至赴星洲者,早期仅十余艘,盛时四十余艘。每船载重千余至一万担(合一百至六百吨),除货物外,每船附载乘客廿余人至百人。顺风时,数日可抵西贡,12日可抵星洲,半月可抵曼谷。”^{[7]196}

据《琼海县志》载“境内草塘一带渔民,常运载西沙、南沙群岛捕捞的海鲜品和贝壳到南洋销售,有少数人随船散居于东南亚各地谋生。”^{[2]4}

明代后,中国政府虽然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但海上贸易始终没有中断。到了清代,由于下南洋的规模扩大,影响了国内社会的稳定,于是清政府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颁布南洋禁航令。据《琼州府志》记载“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甲严洋禁商船,不许私造往南洋贸易,有偷往潜留外国之人,督抚大使通知外国,令解回正法,再奉旨五十六年以前出洋之人,准其载回原籍。”^[8]这说明,在1717年前,已有不少海南人到南洋谋生。南洋禁航令仅行10年,至雍正五年(1727年)以后,陆续在沿海各省解除。虽然禁止移民海外的政策直到鸦片战争前都不曾松动,但海禁的松动,使海南的海外贸易有所恢复。而海外

贸易的恢复,使一批又一批的冒险者,有机会从文昌的铺前港、清澜港和琼海的潭门港、博鳌港等地搭帆船或渔船到南洋谋生。据史料记载:清乾隆年间,已有不少海南人到暹罗、安南和马六甲谋生。又据《新加坡琼州会馆/天后宫史略》载“考我琼同乡南来侨居,当在新加坡开埠前1819年(注:根据地契文件记载)。其时当地乃一未僻之渔村,人烟稀少,同乡居此者亦不多,且散居乡村隅角,而无组织”^[9]。据南洋著名考古学家韩槐准先生考证,在道光元年(1821年),就有帆船自海南运载陶瓷器、铺地之砖、雨伞、鞋、纸、神香、干果及药材等到新加坡销售^[10]。1830年,琼州帆船也已经到达檳城。在海南自宋代以来形成的移民潮中,移民主要来自福建漳州、泉州两地。漳泉人因生活所迫产生的冒险精神,使其先人从福建来到海南。出于同样的原因(海南部分地区土地贫瘠,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大量人口的涌入,造成新的生存压力),部分海南人秉承了先辈冒险闯海精神,利用海南海上交通便利的条件,到南洋谋生。这种现象在海南的东北部尤为突出,因此“海南共分16县,但移居南洋的海南人乃以文昌、琼山、乐会、琼东四县为多”^{[9]265-270}。

历代中国王朝都不认可民众出洋谋生。明、清政府严申海禁,视海外华侨为化外之民,采取“人已出洋,已非我民,我亦不管”的态度。清政府继承了明朝对华侨的政策,也严禁臣民移居海外,视华侨为“弃民”。顺治四年(1647年),清政府颁布《大清律》,规定“凡官员兵民私自出海贸易,及迁移海岛居住耕种者,俱以通贼论,处斩”^{[11]76}。清朝初年海禁政策主要是因为海外有反清活动,但反清复明活动被镇压后,清政府对居留在海外的华侨怀疑态度并没有改变。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康熙帝仍然颁布上谕“凡出洋久留者,该督行文外国,将留下之人,令其解回立斩”^{[11]76},可见清政府对民众出洋态度的严厉。康熙后王朝此种态度虽然有所松动,但根本立场没有变。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帝也有上谕“朕思此等贸易外洋者多系不安本分之人,若听其去来任意,不论年月久远,伊等益无顾忌,轻去其乡而飘流外国者益众矣,嗣后应定限期,若逾期不回,是其人甘心流移外方,无可惋惜,朕意不许令其复回内地”^{[11]76}。对漂泊在外的民众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因此,当乾隆五年(1740年),荷印发生荷兰殖民者肆意屠杀华侨惨案时,乾隆在复福建总督关于此事的奏折时称“天朝弃民,背弃祖宗庐墓,觅利海外,朝廷概不闻问”^{[11]77},就不足为奇了。

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使中国社会发生根本的变化。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强行轰开中国大门,强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攫取了中国巨大利益,使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这些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恩格斯说“对华战争给了古老的中国以致命的打击,国家的闭关自守已不可能。铁道之敷设,蒸汽机和电气之使用以及大工业之创办,即为着军事防御的目的已成为必要的了。于是旧有的小农经济制度也随之而日益瓦解(在旧有的小农经济制度中,农家自己制造必要的工业品),同时,可以安插比较稠密的人口的一切陈旧的社会制度,亦随之崩坏。千百万人将无事可做,将不得不移往外国。”^[12]而国内自乾隆以来人口快速增长产生的社会压力,也使中国社会形成了人口外移的内部推力。因此,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大门后,迫于国外国内的双重压力,清政府无力干涉甚至默许列强在中国贩卖劳工的活动。咸丰八年(1858年),清政府与列强签订《天津条约》,将海口列为对外通商口岸。咸丰九年(1859年),在英法列强的压力下,广东巡抚柏贵及其继任者劳崇光明令,允许人民“任便与外人立约出洋”^[13]。咸丰十年(1860年),清政府终于扯下了羞答答的面纱,正式允许华工出洋。英法联军在这一年攻陷北京后,强迫清政府分别与其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中英北京条约》第五条规定“凡有华民情甘出口,或在英国所属各处,或在外洋别地承工,俱准与英民立约为凭,无论单身,或愿携带家属,一并赴通商各口,下英国船只,毫无禁阻。”^[14]《中法北京条约》第九条也有相似之内容。这两个条约标志着中国明清海禁政策的结束,华工出洋国内法律问题就此解决。1876年,海口正式开埠设立海关。在国内出洋合法化、列强开发东南亚形成巨大劳动力缺口的情况下,大批为生活所迫的海南人于是南下,到南洋各地出卖苦力谋求生计。

西方殖民势力东侵,是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在东侵过程中,他们已不满足于在沿海地区开辟商埠,建立贸易网络,而是用武力侵入内陆地区,扩大占领范围,表现出对土地的浓厚兴趣。他们掠夺矿产,开辟种植园,设立工厂,修建铁路、公路,建立包括现代化的原料生产基地和商品倾销市场的殖民经济体系,以满足世界资本主义扩张的需要。这一切使荷印与海峡殖民地等

东南亚地区的劳动力需求达到空前的规模。就世界范围来说,19世纪中叶,非洲奴隶贸易停止,各国劳动力不足问题十分尖锐。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西方殖民者把注视的目光投向了紧邻东南亚的中国。在其看来,华人劳工是他们开发东南亚殖民地最合适的群体。因此,不论是荷印政府还是英国殖民者,都非常重视华工的作用,采取各种手段,引入华工加入开发殖民地的行列。

近代南洋华侨社会,是以地缘和血缘关系为区隔的,随着海南移民的增加,在南洋各地,逐渐形成了“琼州帮”群体,成为南洋华侨社会的五帮之一。在越南,阮氏王朝对华侨“1807年嘉隆王准允按籍贯、语言分帮管理。七府(漳、泉、潮、广、惠、琼、徽)五帮(福建、广肇、潮州、客家、海南)由此产生。1843年又准允每帮设正副帮长”,管理华侨事务^[15]。日本学者小叶田淳在其所著的《海南岛史》中引用欧洲人的话,说1830年左右“广东省海南岛人使用的语言与福建话只是有转讹的差别,我在暹罗,和海南岛人有多次的交谈机会,大体上用福建话可以了解彼此之间的意思”^[16]。可见当时海南人在暹罗已有不小规模。海南人在泰国,比较集中在曼谷北部的三清、中部的哒叻仔、南部的馋叻三地区。

这一时期海南人大量出洋,除上述原因外,还与赴南洋的交通状况改善有较大关系。在此之前,海南人下南洋的交通工具是木帆船,一般为乘船从海南东部港口启程向西,沿北部湾南下,到越南后,或沿海岸南下到暹罗,或转程到马来半岛的新加坡、檳城、马六甲及印尼廖内、苏门答腊等地,或续程直航到婆罗洲加里曼丹、印尼东爪哇诸岛。木帆船一般利用东北季风,行程约两个星期泊港,若遇上天气恶劣则需要半个多月。不但行程时间长,而且在海上随风漂泊,生死难料,船沉人亡之事时有发生。因此每艘船都安置“天后圣母”,以求保佑平安。而“水尾圣娘”和“108兄弟公”也成为海南人下南洋活动中所崇拜的海神。1890年,乐会县华侨何达启在海口开设森堡船务公司,破天荒第一次驾驶轮船载客出洋,开辟海口至东南亚的新航线,大大缩短了海南与东南亚各地的航程^[17]。随着交通状况的改善,出洋的海南人数量大增。据相关资料统计,从1876年至1898年的23年间,通过客运出洋的琼侨人数达24.47万人次左右,平均每年1万余人次出洋^[27]。

20世纪初,贩卖华工活动虽然结束了,但由于海南连年天灾,加上社会动荡等原因,海南人的出洋活动并没有停止。由台湾琼籍学者苏云峰据中英文本《中国海关历年报告》统计^{[7]203-204},1897年至1928年海南出洋的人数见表1。

表1 历年从海口出洋琼人统计表(1897~1928)

年份	赴香港	赴新加坡	赴曼谷等地	合计(人)
1897				17 203
1898				20 356
1899				21 836
1900				15 254
1901				16 986
1902	3 821	16 252	6 576	26 649
1903	3 117	15 385	3 927	22 429
1904	2 794	14 633	6 484	23 911
1905	2 528	10 622	7 322	20 472
1906	3 200	11 878	7 182	22 260
1907	5 542	26 229	9 830	40 701
1908	3 650	11 948	9 948	25 546
1909	3 917	14 438	9 658	28 013
1910	3 701	27 990	12 732	44 423
1911	3 509	32 432	9 890	45 831
1912	3 736	24 085	11 248	39 096
1913	273	16 858	10 997	28 128
1914		11 297	6 940	18 237
1915		6 536	9 545	16 081
1916		8 166	7 922	16 088
1917				
1918	7 035		5 830	12 865
1919	4 791	2 462	8 996	16 249

年份	赴香港	赴新加坡	赴曼谷等地	合计(人)
1920	4 698	3 278	8 636	16 612
1921	6 208	2 420	9 135	17 781
1922	4 751	7 069	9 995	21 815
1923	4 378	8 894	22 917	36 189
1924	4 807	17 400	28 134	50 341
1925	5 490	28 678	20 907	55 075
1926	1 710	20 411	19 190	41 311
1927	12 213	10 329	26 202	48 744
1928	18 462	537	25 253	44 252

资料来源: 苏云峰《海南历史论文集》

当然, 不可以认为以上数字是海南人出洋数的累计, 也就是说, 这组数字表达的未必全是海南人或全部出洋的海南人, 因为这组数字中有三方面的信息是必须弄清楚的: 第一, 这数字虽是从海口出洋的华工数字, 但其中还应包括雷州半岛一带部分的出洋华工; 第二, 历史上, 海南东北部文昌的清澜港、铺前港以及琼海的潭门港、博鳌港等港口, 都是海南民间自发到南洋谋生的主要出发地, 这一时期虽然以“契约劳工”的方式出洋的华工所占比重上升, 但民间自发式移民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 因此这一时期有一部分海南人出洋是不经过海口海关的, 故未列入其统计数据中; 第三, 海南人出洋的双向性特点, 使这些人中应不乏多次往返者。但不管怎么说, 这些数字总可以看出海南人出洋的概貌。

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到, 海南人出洋人数的增减, 总是与海南以及南洋社会的变化紧密相关。比如 1910 年和 1911 年, 海南发生鼠疫, 米粮昂贵, 加上此时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树胶种植的高峰期, 由于推力和拉力的共同作用, 1910 年和 1911 年海南出洋人数分别达到前所未有的 44 423 人和 45 831 人。而从 1912 年到 1916 年的 5 年间, 出洋人数仅为 117 630 人, 平均一年只有 23 526 人, 只相当于 1910 年的一半左右。1914 年甚至出现返乡比出洋多出 7740 人的状况。究其原因, 应该与海南风调雨顺、社会经济秩序相对稳定有关, 而且 1914 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也可能影响到海南人出洋的意愿。此外, 1913 年琼崖政府取缔“猪仔”贸易, 应该也是海南人出洋减少的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 海峡殖民地和英属马来亚的移民政策, 亦为限制华工大量移入的因素之一。1914 年殖民者废除 19 世纪后半叶颁布的与“猪仔”贸易相关的劳工契约, 改由劳工法替代, 制定了包括卫生和居住条例等在内的比劳工契约更严厉的条款。1916 年契约劳工废止, 华工出洋趋于制度化, 亦导致海南人出洋减少。

1922 年至 1925 年间, 海南人出洋人数又呈现增加状况, 这一轮的出洋原因, 既与海南社会因为军阀统治而秩序混乱有关, 更与南洋橡胶业复苏相联系。广东军阀邓本殷横行海南, 致使海南社会秩序受到严重破坏, 民众生活困苦, 被迫出洋谋生。此外, 1922 年史蒂文生橡胶限产条例奏效, 1925 年橡胶价格回升, 也是海南人出洋人数增加的原因之一。

1927 年, 由于国共关系交恶, 社会动荡, 又逢英国在新加坡三巴旺兴建远东最大军事基地, 需要大批劳工, 于是海南出洋人数创历史新高。

1929 年, 蔓延世界的经济危机, 导致世界经济陷入低谷。为了应对经济危机的冲击, 1930 年马来亚英殖民政府实施“移民限制法令”(Immigration Restriction Ordinance)。此法令实施 4 年, 移民限额介于每年 1 000 ~ 2 500 人。并且, 由于世界经济整体不景气的原因, 导致生活在马来亚社会底层的大量海南人难以寻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机会, 处于失业状态。英殖民政府为处置马来联邦劳工过剩问题, 曾权宜性拨出数百万元费用, 将数千华工遣返中国^{[18]68}。英殖民政府的这种遣返政策, 表现在海南移民中则如陈献荣在《琼崖》一书所述的那样: “近年南洋经济衰落的影响, 星加坡政府因胶、锡两项价格暴跌, 取缔华工入口; 且安南(今越南)、爪哇土人常和华工冲突, 华工受其排斥, 故都纷纷相率回国, 而琼人回琼, 也实繁有徒”^{[18]68}。

马来亚移民限制法令实施 4 年后, 1933 年改由“外侨法令”(Aliens Ordinance) 取代。外侨法令规定新至移民必须拥有登岸字, 并以此准字于登岸换取入口证, 或缴纳手续费 5 元。持有入口证者, 即指领证人未有违反限额条例。由于限制政策过多, 且船费涨价, 贫苦人家不易移民马来亚。但相对于家乡恶劣的

生活环境而言,移民马来亚还是有吸引力的。因此,尽管英殖民政府限制颇多,但偷渡马来亚现象还是有发生。1938年,一批为数一百余的海南人乘帆船,企图偷渡马来亚,在柔佛丰盛港被拘捕即为一例。事发后,丰盛港琼州会馆虽极力奔走营救,但事关移民律例,不得通融,海南偷渡者遭判监禁一个月,然后被遣送返琼^{[18]69}。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国社会秩序遭破坏,特别是1939年日本侵略铁蹄踏上海南,海南面临战火煎熬。为避战祸,大批海南人拖家带口,冒着被日军打死的危险从海南各个传统出洋港口,如海口、清澜、铺前、潭门等地乘帆船,闯渡琼州海峡到当时还是法国租界的湛江避难,然后乘轮船到南洋各地投靠亲人。也有从陆路经广西进入越南,或经云南到缅甸。据琼海关统计,1936年出洋人数为33 000多人,1937年为44 000多人,到1939年,仅逃到湛江的就达50 000人,后经由琼侨总会的救济帮助,绝大部分转向新、马、泰等地。

此外,这个时期海南出洋人数增加,与海南出洋人口结构的变化有直接关系。此前海南女性未曾出洋,20世纪初,才偶有海南女性下南洋。比较多的一种说法是,第一位下南洋的海南女性是1904年“偷渡”到新加坡的(当然也有不同的说法)^①。此后不断有人效仿南下,与亲人团聚或嫁到南洋。随着海南妇女南下,海南人在新、马人数比此前有较大的增加。如新加坡,1881年只有8 319人,1911年增至10 504人,到1931年发展到19 896人,1947年这一数字上升为52 000多人。到1931年,新加坡琼籍人口男女两性的比例为1 000:151。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传统的回家娶亲,把妻子留在家乡,自己再出洋,之后有条件再申请妻子入境的情况仍占主流。二战后,海南男性大都在本地成家立室,并打破以往不与其他籍贯人士通婚的惯例后,这一传统的婚姻形式才发生根本的改变^[10]。其他地方情况基本类似。

虽然各方面的统计的数字有出入^②,但基本上能反映海南人出洋的概貌。各方面资料都呈现:文昌人是出洋的主体^③。

抗战胜利后,海南结束战争状态,社会秩序有所恢复,海南人出洋速度有所放缓。据南洋英属琼州会馆联合会《会报》称:琼人出洋,1946年为1 800人。但随着国共内战爆发,战争烽烟再起,为躲避战火,海南人又开始大量出洋。1947年出洋人数猛增到8 000人,1948年又增至上万人。因出国人数增多,海口至东南亚各地的船票一票难求,黑市上一张船票被炒至100光洋,许多人卖田典牛外逃“去番”。这些出洋人,一部分是为逃避国民党抓壮丁而逃去南洋,一部分是国民党军政要员及地方上一些与国民党关系密切人士,目睹国民政府节节败退,对前途失去信心,携眷出逃。

解放后,国内社会秩序井然,百姓生活安定,人们出洋动机不再,导致出洋人数锐减。20世纪50年代出洋者中,除了一部分是归侨重返侨居国之外,其他多是因夫妻、子女家庭团聚、或结婚、或继承财产、或求学或谋生等原因而出洋,总的来说,规模不大。海南解放后,经过了清匪反霸、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等政治运动和经济改革,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而1951年马来亚政府实施“人力动员令”,致使当地华侨难于谋生,部分人选择了回国。于是出现回国定居人数多于出国人数的情况^[19],详见表2。

20世纪60至70年代,出于当时国内外的政治环境,出国者甚少。80年代后,中国改革开放,既极大地提高了国家的综合实力,也大大改善了与东南亚及其他各国的关系。这些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允许中国私人探亲、旅游、留学,甚至移民,于是海南出国人数又呈现上升态势。

表2 20世纪50年代出、归国人数统计表

日期	出国人数	回国定居
1950年6月至月底	2 176	4 616
1951年	4 527	9 144
1952年	1 274	2 558
1953年	827	974

① 1995年出版的《琼海县志》记载,早在1859年,海南地方戏团在东南亚演出,名旦李凤兰与赴东南亚各地献演的首批名伶卢彩文结为夫妇,后留居南洋,带班传艺,成为海南最早的出洋女性。

② 詹长智认为,1902至1911年间,从海南迁往新加坡和泰国的人口,平均每年达2.7万人(见詹长智《中国人口(海南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85页)。另据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一月十七日琼海关代理税务司统计,自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起的10年中,从海口出洋的华工总数达206 811人(见朱荣基《光绪末期海口贩运华工出洋若干史实》,《历史档案》1984年第4期)。

③ 苏云峰称“移出地集中于海南东北部人口稠密区,而尤以文昌一县为最多”(见苏云峰《海南历史论文集》,海南出版社2002年版,第209页)。陈铭枢称“各县在外侨民最多者当首推文昌,约9万人”(见陈铭枢《海南岛志》,海南出版社2004年版,第135页)。

如果说,改革开放前,海南人移民的主要目的地是东南亚各国和港澳地区的话,那么,改革开放后,海南人的移民地呈现多样化的特点。除一部分因为亲情关系移居东南亚和港澳地区外,有一些是以技术移民、投资移民和留学的方式移居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欧洲及南美等地;有一些是以劳务输出的方式,到日本等国,在结束劳务合同后,以不同的理由定居下来;有一些是以婚姻的方式,将自己嫁到世界各地。此外,这一时期移民中具有与此前移民不曾有的特点,那就是有一部分移民文化素质高,经济实力雄厚。他们并非因生活所迫远走他乡,而是为了谋求更好的个人发展空间,移居国外。

据侨务部门的估计,目前旅居海外的海南人超过 300 万人,分布在全世界五大洲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被称为“凡是有海水的地方,都有海南人”。

二、海南人下南洋的主要形式

就移民形式而言,近代海南人下南洋主要有三种:自由移民、客头招募和洋行招募。自由移民是指传统经商移民和非契约劳工移民,一般由自己负担交通、住宿等旅途费用;客头招募的移民一般是由客头先行垫付移民途中的交通、住宿等各项费用,到达目的地后经客头牵引,与雇主签订务工契约;洋行招募的移民一般是在移出地由移民和洋行签订契约,洋行支付移民途中的各种费用,到目的地后转让给雇主。客头和洋行招募的移民大多为“猪仔”移民,由于其签订契约的共同特点,因此常被合称为契约移民。一般而言,19 世纪上半叶和 20 世纪上半叶,自由移民是海南人下南洋的主要形式,19 世纪下半叶(即鸦片战争至民国初年废除劳工出洋规定止)则以客头招募和洋行招募为主要形式。

“契约劳工”当时的俗称谓之“猪仔”,海南籍台湾学者苏云峰认为:海南的“猪仔”贸易开始于 1876 年,一直到 1913 年结束^{[7]199}。主持此类活动的是德国商行“森宝洋行”,它自 1886 年起在海口设立“招工馆”^④11 间。法国商行“哩哩洋行”与“几利么洋行”,也共设“招工馆”。海口港成为近代贩运“猪仔”的主要口岸之一。文昌、琼海、琼山、万宁等地有许多“客头”活动,他们张贴广告,引诱穷苦农民出洋。

被贩卖的华工命运是非常悲惨的。琼海关代理税务司曾对从文岛回国的被掠华工进行调查,该司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七月十四日申呈两广总督兼关务之道字第 1008 号文记载:

该岛所有之公司,均系洋人所设。工作分为两项,一系开锡矿,一系种胡椒。开矿工金稍优,每日可得铜汇三十六枚,以一月计之,所得工金约合华银七元四角上下。工头按日扣除铜汇十二枚,以为饭食之费。种胡椒工金较贱,且无定价,每日工金视工人做工之勤惰分别多少,然亦不过自二十四枚铜汇发至三十四枚铜汇为止。是至多之数,亦较诸开矿工金少去二枚铜汇。每日亦须由工头扣除铜汇十二枚为饭食费。

至于两项工做(作)之时刻,均归工头定限。每日自晨早六点钟起工,至下午五点钟始得散工。不逢年节之期,即礼拜亦不放假休息。

各工应做之工程,一经工头派定,无论强弱胜任与否,均须一日做完,方有工金发给。否则,不罚全工即罚半工。或工做(作)稍有不力,则鞭挞从事,痛楚难堪。

若值天阴不能上场工做(作),或工人患病之时,非特不发予本日之工金,仍须照扣饭食之费。工人住所亦极卑陋不堪。每日饭食固属粗粝,菜亦只有咸鱼野蔬两种,且并不多。苟然自行破钞添买菜蔬,则必不能卒食。

倘有华工在彼病故,则由工头市一薄棺,草草装殓,埋于旷野。死者若有遗资,不拘多寡,咸归工头承受,无敢议其非者。^[20]

由此可见,被贩华工受尽磨难。

“契约劳工”的非人遭遇,引起了社会公愤,中华民国建立后,孙中山颁布了《大总统令外交部妥筹禁绝贩卖猪仔及保护华侨办法文》和《大总统令广东都督严行禁止贩卖猪仔文》,“猪仔”贸易逐渐式微。1913 年,海南地方政府枪毙名称阿二的猪仔头后,海南的“猪仔”贸易才告结束。

自由移民是在血缘、亲缘、乡缘、情缘等一系列人际关系组合基础上运作的移民形式。新移民一般在

④ “招工馆”当时人称之为“猪仔栏”,外在的形式似小客栈,用以囤积“猪仔”,等待运送“猪仔”船只的到来。见张燮宇、周荣解《镇守使邓铿严惩狗腿子阿六》,海口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编《海口文史资料》第 1 辑。

国内自己付费或已有人垫付旅费,然后乘船到东南亚目的地。这些人一般在目的地都有自己的亲戚、同乡或朋友等关系较亲近的人,可以依靠他们的照顾、帮助,如在他们经营的店铺里当学徒、店员,或经由他们的介绍找到一份工作,由此克服初来乍到之不适。若干年后,他们适应了环境,有了稳定的工作,或自己成了店主后,他们又会尽量把亲朋好友或熟悉的人接到东南亚来,有时他们还会替这些人先垫付旅费,接过来后在自己家里慢慢找事做,等到有钱了再还。如此反复,形成一条“移民链”。

在海南人下南洋过程中,香港是一个重要的中转站。许多海南人会先到香港集合,由此换定期船往南洋。而到南洋后,新加坡是一个重要的集散地。许多海南人先到新加坡,再转乘其他船到苏门答腊、婆罗洲、爪哇、缅甸、马来半岛或暹罗、安南等地,或在新加坡熟悉东南亚环境后,再散居各地。

三、女人不下南洋的“乡规”

在20世纪上半叶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作为南洋社会五大族群之一,海南人在下南洋的过程中,有一个所谓“乡规”,即女人不下南洋。当时下南洋的男人,结了婚的,为养家糊口而到南洋打工;没有结婚的,到南洋打工有了一些积蓄后,便回乡成亲。结婚后,有的男人留在家乡,不再出洋。更多的男人为了养家糊口,重返南洋打拼,把妻子留在家乡,赡养长辈,抚育孩子,操持家务。这种特别的生活模式,练就了侨乡女性里里外外一把手、遇事能独挡一面的生活能力。重返南洋的男人,打拼几年后,只要条件许可,都会回家探望亲人,穿梭于故乡与南洋之间;但也有人几十年甚至一辈子都未能再回家乡,留下妻子独守空房。因此,“留守新娘”成为海南侨乡社会的一大现象。据1953年文昌县一个有关华侨婚姻的调查,文昌有丈夫在国外的侨眷约占65%以上。如一区南新乡山桥村,全村有13户已结婚的侨眷,其中丈夫出洋的有10户,在家的只有3户^⑤。据笔者所做的粗略田野调查可知,在文昌,几乎在有出洋人群的村庄,都有数目不等的“留守新娘”。因此,在海南侨乡流传了不少描述夫妻因丈夫下南洋而分居的民谣:“送郎送到码头分,郎你去番依心闷。眼汁滴到土落窟,日头看路夜看船。”“送夫送到万泉河,河水倒映影双双;夫妻都如鱼和水,鱼水分离几凄凉。”“夫郎离家南洋去,一去十年无回书;坐在石上望夫回,泪流成河浸石浮。”“鸡啼一阵又一阵,夫妻二人将离分;卧在床上不舍起,双双枕头添泪痕”……等,难以计数。

至于海南男性为何不带眷属出洋,其原因主要有:第一,经济的原因。当时的出洋人,大部分是迫于生活压力而飘洋过海的,他们出洋的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到南洋挣钱,养家糊口,衣锦还乡,光宗耀祖,到南洋作客的心态非常明显。而且由于文化水平低,到南洋后基本上是劳工阶层,收入有限,无力携眷同行。第二,社会的原因。孔孟传统观念对人们的影响根深蒂固,即男人在外打拼,女人在家中孝敬父母尽妇道。第三,习俗的原因。由于文昌、琼海、琼山等地移民后裔“故家大半来中土”^{[4]41-42},社会上,男重礼俗、女守闺阁的风气影响较重,据此认为在外抛头露面者,一定是不良女性,这种观念也影响了海南女性随男性出洋谋生。第四,性妒嫉心理。即一群单身汉中,难于容忍其中一人携眷同行。因此“不准女人出洋”成为出洋之海南人不成文的口头约定。这种有别于其他地域移民的观念,使得有条件携眷的绅商人士,亦不敢犯众怒^{[7]209-230}。

“据传第一位琼籍女性是在1904年‘偷渡’到新加坡来。这位琼籍女性的胆量过人,她首先到香港,学会了广府话,而打扮为广东妇女,由香港辗转到新加坡。这位勇敢的琼籍女性抵星时,住在一家客栈内,曾引起了一场‘震动’。”^{[9]265}可见当时出洋的琼籍男性是多么不能容忍在家女性的飘洋过海。后经有识之士的呼吁,情况有所改观,但妇女出洋仍然困难重重。正因为如此,1923年4月间,文昌人陈时新秘密携带妻室出洋,秘居在星洲山村。后被发现,在琼侨中闹起风波,幸得开通商家相助,请当地华民政务司出面干涉,方得平息。陈序经在《珠崖篇》中也讲到“我记得少年在新加坡,曾看到有人从海南乡间带妻女到新加坡,一上岸就被一些新加坡海南青年殴打,结果是不得不乘原船回去。”在泰国,侨贤林树兰是第一个响应贤达号召,致函故里妻室,附轮赴泰的。林妻甫抵码头,还受到一些人侮辱^{[4]491}。

海南女人在下南洋之初,不少人是经澳门才到南洋与丈夫团聚的,因此,到南洋的海南女性也被称为“macao bou”(其中macao是澳门的英文名,而bou是海南话中对已婚女性的统称)。

^⑤ 据海南档案馆资料。

[参考文献]

- [1]陈伦炯. 海国见闻录[M]//杜定友,丘岳宋. 中国南海诸群岛文献汇编之三. 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4.
- [2]王桢华. 琼海市华侨志[M].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
- [3]海南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 海南百科全书[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708.
- [4]文昌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文昌县志[M]. 北京:方志出版社,2000.
- [5]王翔. 海南人移民东南亚的历史过程[J]. 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1(6):90-101.
- [6]潘干. 琼山县最早出洋帆船的兴衰史[M]//琼山县政协文史编辑委员会. 琼山文史资料:第5期. 府城:琼山县政协文史编辑委员会,1989.
- [7]苏云峰. 海南历史论文集[M]. 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
- [8]琼州府志:卷42[M]. 光绪刻本:989.
- [9]新加坡琼州会馆秘书处. 新加坡琼州会馆庆祝成立一百三十五周年纪念特刊[J]. 新加坡琼州会馆,1989(1):101.
- [10]韩槐准. 琼州南洋交通考[J]. 新加坡琼州会馆联合会报,1948(1):[页码不详].
- [11]夏诚华. 近代广东省侨汇研究(1862-1949)——以广、潮、梅、琼地区为例[M]. 台北:史料出版社,1992.
- [12]恩格斯. 1894年11月10日恩格斯致佐尔格的信[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0:153.
- [13]陈翰笙.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二辑[M]. 北京:中华书局,1985:179.
- [14]王铁崖.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144.
- [15]徐善福. 十七——十九世纪的越南南方华侨[M]//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 华侨史论文集:第1集. 广州: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1981.:95.
- [16]小叶田淳. 海南岛史[M]. 张迅齐,译. 台北:学海出版社,1979:254.
- [17]唐若玲. 海南华侨在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贡献[J]. 湖北社会科学,2013(8):102-106.
- [18]安焕然,吴华. 远观沧海阔——海南历史综述(海南岛·马来西亚·柔佛)[M]. 马来西亚:南方学院出版社,2009.
- [19]潘干. 海南侨乡社会的形成、特点及其发展[M]//海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海外琼人:专辑之一.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9:75.
- [20]朱荣基. 光绪末期海口贩运华工出洋若干史实[J]. 历史档案,1984(4):106-109.

[责任编辑:王学振]

A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Hainanese Immigrating to Nanyang

TANG Ruo-ling

(School of Marxism, Hainan Normal University, Haikou 571158, China)

Abstract: Hainan is located on the Maritime Silk Road. In early times, Hainanese participated in the overseas trade. Because of this, some of them needed to live abroad and they finally became the early overseas Chinese. In modern times, especially after the Second Opium War, some factors, mainl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estern powers in the Southeast Asia and the domestic hard life formed the high tide of Hainanese immigration to Nanyang. Since then, the population of Hainanese immigration to Nanyang was related to the social order of Hainan as well as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environment of Southeast Asia. In modern times, Hainanese immigrated to Nanyang in three forms: free immigration, overseas organizers' recruitment and foreign firms' recruitment. Wenchang people were the main part of them and they had a so-called "local rule" for a long time that women weren't allowed to go overseas.

Key words: Hainan; Hainanese; immigrating to Nanyang; trade; piglets